

#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二十二期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编者的话：**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达尔文说是趋利避害，赫胥黎说是从善弃恶。其实二者都不错。不过在现实中，还要有法律和道德等加以制衡。虽然并不总是那么有效。

在一个相对正常的环境，人们在追求目标(趋利)之时总要顾及道德和法律，在寻求保护(避害)之时也能借助道德和法律。但是，当道德和法律被颠覆，甚至连追求个人利益都被宣布为非法的时候，事情就陷入了混乱。

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制止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当你阻塞了正当的渠道，它就会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大概就是作者所说的“现象与本质的背离”吧。

传统社会，明哲保身者最消极的处事之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新社会连这也颠覆了。在那场反右运动中，劝诱别人解除防人之心时，发动者们自己却存着害人之心，正如某位领导所说：“这一次我们就是要有害人之心”。这倒成了最理直气壮的事情。

每次运动都有自己的受益者与受害者。在本文中，受益者靠害人上位，而受害者却无以自保，除了逆来顺受甚至向害人者求助，别无出路；而害人者也从中看到了捞取好处的机会，二者达成了默契。刀俎要的是升迁之途，鱼肉要的是解脱之路。于是，在公有制之下，“人民公敌”竟沦为私人的奴隶，并且在榨干剩余价值后，交给广大人民去专政，直搞得家破人亡……或者在受益者只须举手之劳，甚至不须举手之劳，只须不加阻碍便能放人一条生路之时，却偏偏要落井下石，

横生阻挠——套用老戏文中的话说：“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何要赶尽杀绝呢？通观全文，害人为恶者似乎并非出于阶级仇恨，也与“斗争哲学”无关。说到底，他不过是一个历史上常见的钻营者，一个出身底层努力攀爬的小人物，他所做的，无非是“趋利避害”，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他的为恶不过是顺势而为。在他那不堪足读的小说里写的那些阶级斗争公而忘私的后面，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一套。这样的人格在极权社会中比比皆是，也是一种平庸之恶吧。

至于他在被作者揭破时的表现，究竟是良心发现，还是更像一个潜逃了多年的案犯，在被捉住的一刻放松下来？他是想就以往的恶行向受害者道歉，还是仅求缓颊甚至有为自己“不得不为恶”的辩解意味？斯人已去，他的内心究竟如何，再也无从知晓。可以设想，只要体制不变，如果重新开始，“他”还会重新来过，还会出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姜树茂”，故此谓之“现象”。

## 我所亲历的“姜树茂现象” 刘禹轩

—

1993年6月15日，《青岛日报》第一版右下角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标题是“著名作家姜树茂逝世”，我现在一字不易地照抄如下：

本报讯 著名作家，青岛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姜树茂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3年6月9日21时30分在青岛病逝，终年59岁。

姜树茂同志1949年1月参加革命，195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崂山区委调研员、青岛《海鸥》文学月刊主编、市文化局副局长、市

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等职，曾任山东省第五届人大代表、青岛市第八、九、十、十一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山东分会副主席、青岛市对外文化友人联谊会会长。

姜树茂同志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认真执行党的文艺工作方针，热情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作发表了《渔岛怒潮》、《常乐岛》等大量文学作品，在社会上产生很好的反响。他长期担任我市文艺界领导工作，为繁荣发展我市文艺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作风正派，光明磊落，为人正直，团结同志，勤奋好学，任劳任怨，为党的文艺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姜树茂同志的遗体定于6月14日上午9时火化。

这则报道列举了姜树茂担任过的重要职务，第三段更对他的作品和人品揄扬备至，却有一处硬伤，说他“创作发表了《渔岛怒潮》、《常乐岛》等大量文学作品”，却偏偏没提他的上下两卷的长篇《渔港之春》。再者，他的《长乐岛》其实只能算是一个中篇。奇怪的是，报道把书名《长乐岛》的“长”错成了“常”，让人怀疑记者是否看过这本书。

## 二

现在该说一说我所认识的姜树茂其人了。我1948年夏大学毕业后，从南京乘船到青岛，同年秋到山东解放区参加工作。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我随军入城参与山东大学的接管。1951年春，华东大学从济南迁到青岛和山东大学

合并，我们最初一批接管干部全部调离，我到青岛市中苏友好协会主持宣传和俄文教学工作。1956年10月，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我被调到青岛市文联筹委会，任务是筹备召开第一届市文代会，正式成立青岛市文联，并准备创办《海鸥》文学月刊。在此之前，文联筹委会已经把陈硕、孟力两位同志派驻《青岛日报》编辑《青岛文艺》副刊，并且刊发过姜树茂的几个短篇。他们说姜文化不高，原稿都由别人先给誊清，仍然错误百出。但他一心想当作家，对两位编辑执礼甚恭，一口一个“老师”，还常常带去几个苹果。加上培养工农兵作者是编辑的头等任务，因而就把他当做重点扶植的对象，使他得以在青岛的作者队伍中早早地脱颖而出。

青岛市第一届文代会于1957年初春“胜利”召开并“胜利”闭幕。山东大学教授、校委会副主委陆侃如，中文系教授、诗人高兰，版画、篆刻、书法家石可，以及文学、美术、音乐、戏剧、书法各界的代表人物当选为主席和副主席，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林明为驻会的常务副主席。这真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圆满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但是，正如大家都知道的，紧接着就是整风，又紧接着一变而为反右。不但上举的主席、副主席以及陈硕、孟力全都成了右派，连新调去的我和母振元（雕塑家）、曹述之（戏曲作者）、仇非（作家）也“榜”上有名。这样，正式成立了的青岛市文联的15个干部就打了8个右派。其中最冤枉的要数刚上任就下台的林明了。他从市委宣传部来到文联，一切按照市委的指示办，整天汇报请示，仿佛就为了捞这项右派帽子。他不但自己没有想到，对这么多新来乍到的同志几乎被“一锅端”也感到意外，仿佛受到了自己的连累，因而由“同情”而“包庇”右派到自己也成了右派。当然，所谓“双百方针”也就成了“引蛇出洞”的“阳谋”。这时的姜树茂已经由一个“业余作者”提拔为市委

宣传部文艺科的干部，并被派到文联参与反右这一重大政治任务的领导，以他的“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当然在“摧毁”林明右派集团中起了可以想见的作用。因此青岛市文联的反右能够取得“全面的胜利”，当然少不了他的一份功劳。果然，他此后就留下来成了文联的领导。1958年我被给以劳动教养的处分，就是他送我到李村去集中等待出发的。当路过农业科学研究所时，我想进去向我的妻子和孩子道别一下，他只斩钉截铁地吐出了两个字：“不行！”直到现在，五十四年过去了，我一想到当时的情景，还从头顶一直冷到脚跟。

### 三

我被送去劳动教养。这是反右运动的产物，也是共和国在“法制”中的一大创造。“劳改有期，劳教无期”，说是看右派分子改造得如何而定。这实际上不是“教养”，而是挨饿，受累，受辱，受刑，许多人饿死、累死、冻死、打死了，我一直到三年半之后，即1962年4月，才又带着一身病和一顶“帽子”回到文联，而我的一个同小组的“同学”（教养员不得称任何人为“同志”，只能互称“同学”），却被“教养”了27年之久，直到1981年才被补行“改正”。这时的文联，林明和石可已经调走，仇非在月子口水库劳动时，因为在家信中发牢骚被检举，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此后不久母振元又因病去世，文联就剩下陈硕、孟力、曹述之和我四个右派。我们都已没有工资，只有十几到二三十元的“生活费”，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但是，养尊处优、已经成了文联主席的姜大官人（我们背地里这样称呼他），是不会顾念这些的。我们是劳力，除了清扫庭院、厕所、挖干道、防空洞外，还要为他写《渔岛怒潮》出力。陈、孟、曹三位给他的人物、

情节、文字出谋划策，修改润饰，我则被他用其所长，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而且要自带干粮，为他一遍又一遍地抄个不停，直到“杀青”，因为当时没有中文打字机，更不曾见过复印机和电脑，我就成了他的高效的“录事”，每天至少抄一万多字。这不仅因为他不屑于再干这种活儿，还因为他那一笔字实在见不得人，一笔一划不但塞不进格子里去，而且连写成一行也办不到。这还不算，他的“书法”如果不是我们这几个看惯了的老编辑，谁也难以认得写的究竟都是些什么。就这样，穷五个人三年多之力，作家姜树茂的长篇巨著终于完成并且出版发行，而姜树茂主席也就成了青岛的光荣、骄傲和宝贝，真可谓文运官运齐亨通。“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我不能不想到杜甫这两句诗。

四个右派这样为姜效劳，他是不是也有所回报呢？有的，这就是给孟力摘了“帽子”。孟力是个好人和有才华的人，1948年春天就从青岛到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上勤勤恳恳，写过诗歌和短篇小说，和陈硕同为姜成为作家的领路人。谁都知道他在《渔岛怒潮》的创作中出力最多，贡献最大，但我听了他对我推心置腹的自白和劝告，仍然感到吃惊，不，应当说是震惊。我离家远，中午不回去吃饭，他就利用这个机会，牺牲了自己的午饭和午休，特意找到我作了一次语重心长、披肝沥胆的谈话，表现了他对我的真诚的关心：

“……毛主席不是在《矛盾论》里说了吗？抓住主要矛盾，其他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现在什么是你的主要矛盾？就是这顶帽子。因此要千方百计弄掉这顶帽子。怎样弄掉？还是得照毛主席说的办，就是要在主要矛盾中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然是姜树茂。他是文联主席，是党组书记。是他姜主席，而不是毛主席，能给你摘掉帽子。什么叫‘改造好了’？他说了算，毛主席才不管呢。”

孟力说，我听。我甚至提不出任何问题，例如，“你这顶帽子是怎样弄掉的呢？”好在他自己作了回答：

“当然，”他说，“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给他写稿子，改稿子，抄稿子，买粮，买菜，买煤。他住在楼上，煤得一麻袋一麻袋往上背，又没人给‘发’，给接，一千斤连装带拉带卸，爬了台阶再爬楼梯，一次就得一天，还得自带干粮。有一次，他让我给他亲戚家买一口十印大锅，直径和我的身高差不多，又没有车拉，从四方路一直背到他亲戚家，上坡下坡，上沿儿啃着脖子，下沿儿啃着脚后筋，血都啃出来了，可是没有办法。我咬着牙，只想着：‘摘帽子！摘帽子！’——要不，还能会有今天！”

“我知道你很难做到这一点，”孟力见我沉默不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但是，你不做也得做。说实在的，如果不是为了老婆孩子，我早就跳海了。现在，我们活着已经不是光为了自己，那太自私。而且你不是不知道，你自杀，他们还要再给你加上一条‘自绝于人民’的罪名，使一家人更抬不起头来。要说我为了摘帽巴结姜树茂，我承认。但我没有给他磕头，送礼，为了‘立功’去诬陷别人，只是给他干干活儿，弄弄稿子，我觉得良心上也不能说过不去。……”

“禹轩！”孟力见我仍然不吭声，时间又不便多待，就站起来喊了一声，而他平时总是叫我“老刘”，从来不这样直呼名字的。“我再说一遍，有权力给你摘帽的只有姜树茂。别相信改造好了就能摘帽的话。老陈和老曹够老实了吧？为什么没给他们摘？你回来为什么还戴着帽子？不是那里不想摘，是这里不让摘。你看，一个机关里保留着几个右派多好啊，不论谁的稿子都有人抄，不管谁的私事都有人办，而且作为‘反面教员’，还是提高阶级感情和阶级觉悟的活教材。我实话对你说了吧，禹轩，我最关心也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他们就说你不老实，低

头认罪不够，放不下架子，还有抵触情绪，这怎么行？怎么能指望姜树茂给你摘帽子？我希望你认真考虑我的话。除了你我对谁也不会说这些话的。”

“谢谢你，老孟，”我不能不说话了，因为楼梯响了。“我一定认真考虑。”我们紧紧地握了握手，他就走了。

晚上我回到家里，孩子已经入睡。我却怎么也睡不着。孟力的话像铅一样压在我的心上。他说的完全对。我的命运确实只掌握在姜树茂的手里，这个貌不惊人、才不压众的半文盲的作家和领导的手里。难道我能虽不胁肩谄笑却难免卑躬屈膝地向他献殷勤、向他“靠拢”吗？妻问我有什么事，我把孟力的话说了一遍问她：“为了摘掉这顶帽子，你愿意我像他那样吗？”她沉默了一阵，擦了擦眼泪，轻声地说：“不摘就不摘吧！”

啊，亲爱的，为了这句“不摘就不摘吧”，我们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啊！

#### 四

1966年6月“文革”初起，我忽然被“遣返”。在此之前，支部书记吕斌（女）多次告诉我，到国庆节一定会为我摘帽。她是个会计，却又是个老干部的续弦夫人，即通常所说的官太太，摘帽云云大概不会是和姜树茂的共识，但支部书记虽然没有党组书记官大，总也不是空头支票，因而我一直焦急地盼望着这一天，不料盼来盼去，得到的却是“遣返”！“遣返”的原意是让战俘回家团圆，本来是最人道的一个字眼，现在却成了置人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境地的催命符！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任何正式程序的强盗行径，只是吕斌加上本单位的三个胡子红卫兵，贴出了一张“勒令”我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字报，我就等



于被永远开除公职了。这一次送我回原籍的不是姜树茂，因为他不管是不是“走资”，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当权派”，暂时“靠边站”了。因此，送，不，押送我的的是一个姓刘的造反派和他叫来的四个红卫兵中学生。我和他平时的关系还不错，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一变而穷凶极恶到这样的程度：先往我脖子上挂一个黑牌子，上写“右派分子刘禹轩”，然后把我推搡到火车站，上了火车还不让我坐，在众目睽睽之下站了一路，押到公社后就回青岛，剩下的十二里路我只能自己背着行李踉踉跄跄、连滚带爬地摸了去……

我在早已没有一个亲人的山东省东明县陆圈公社刘堂村，这一待就是十三年！这时的右派已经成了“终身制”，整天从广播喇叭筒子里听到的是“人还在，心不死”，“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这时使我坚持活下去的是我的兄弟姐妹，是我的乡亲，是我的朋友，是我要和亲人终归团圆的期盼。我无法在这里细说他们对我的厚爱。就说曹述之吧，我从他的信里得知，他和陈硕接着也被遣返了。他的老母亲已经去世，他再也没有什么牵挂，曹家庄比青岛市文联的人和空气都好得多，生活水平比三十元养活母子二人还好过一些。他说他比我大十四岁，也还比“万寿无疆”年轻，我就更不必说了。因此千万不要灰心丧气，要往前看。他甚至于说到“你总得等我死了才能死”，我难道不感动得流泪吗？是的，我总得活下去，我又想起了孟力的话：“我们活着已经不是光为了自己……”。

但是，更大的打击，不，一生中最大的打击落在了我的头上。我的妻，我的爱，我最亲的亲人，我曾经的中学同学，我的同在南京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毕业的爱人，我的一对儿女的母亲，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优秀工作者，于 1971 年 1 月 21 日突然离世！她不是死于日本鬼子，不是死于疾病，不是死于车祸，而是死于一个披着人民警察和共产党员外衣的豺狼之手。她到惜福镇调查小麦生

长情况，夜里被敲开房门，说有她的长途电话，她一开门这个恶狼就把她扑倒在床上，她喊叫，她挣扎，这恶狼就掐……我不能再说下去了……

“活还是不活？”我面对哈姆雷特的问题。这次是姐姐以她的爱拯救了我。我一被遣返，她就坐汽车加步行去看望我，给我带去吃的和穿的。还有零用钱。她是个穷人，姐夫是开封一位小学教师，收入菲薄，她成年累月为人作嫁，一针一线地做衣服，做布鞋，纳鞋底，给人家定做和拿到市场上去卖。她又给我做鞋，把外甥们的工作服带给我穿，每年还让我到开封去过年。我接到朋友杨阳告知噩耗的信时正在她跟前。她让我把头埋在她双膝之间哭了个够，而后就为我打点路费和行囊到青岛去探望，这就使我又一次接触了姜树茂。

## 五

我又到了青岛市文联，原支部书记吕斌已经死于肺癌，我就见到了姜树茂。我不见他又来干什么呢？我知道他不会给我好脸色，否则，我的家遭到了这样的变故，原单位怎么也应该通知我一下。果然，他见了我并没有表示惊异，只是很冷漠地问了句：“你来做什么？”我知道话多说一句也没用，就说我只希望回来和孩子住在一起，自食其力。他问我住在哪里，我当然如实相告，说在什么路几号，户主谁谁谁，我原先的一个中学同学。他说：“那你就回那里等着，我们研究研究。”我听了他的话回到同学家，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上午一早，两个警察叫我跟他们到不远的泰安路派出所，到屋里也不让我坐，只能蹲在他们面前。其中一个说：“你啥也不用说，你原单位的领导已经交代给我们，你是个右派分子，遣返了就别想回来，叫我们把你赶回去！限你今天就走。要不，赵老师（我

的同学)要负窝藏你的责任!”我站起来,不知道说什么好,第一个警察就吼起来:“你还不赶快走,非等我们动手吗?告诉你,明天要是再在赵家看见你,连他也没有好果子吃!”

就这样,我满腔悲愤地走出派出所,到同学家提起行李卷告别,说不能再连累他们。老同学赵大哥也实在无奈,翻来翻去凑了四十块钱硬塞给我当路费,放我走了。

我到哪里去呢?走着走着,好像鬼使神差似的,不觉又到了姜树茂公馆的门口,正想转身回去,忽然一个人从旁抓住了我。“你不是禹轩吗?到哪里去?——走,跟我回家!前面就是。”不容分说,拉着我就到了龙江路21号,离姜公馆不过对街一百多步。这是个单门独院,虽然窄狭,倒很安静。他先让夫人倒茶,不等我开口就说:“你的事不光我知道,熟人谁不知道?——是来上访吧?”“也算是吧,”我说,就重述了两天来的遭遇。“姜树茂算啥人,你找他干什么?现在市政府前面每天都有很多人上访,有的只是打听消息,你也可以去听听信,就住在我这里。你放心,我是个逍遥派,没辫子可抓,运动里光说些天官赐福的话,无党无派,灰色的‘基本群众’一个,学生同事都关系不错,谁也咋不着我。”说着夫人已经摆好了饭菜,让我们去吃,我就这样住了下来。

第三天,又有一位不速之客被他抓了来,竟然是陈硕!他也是来“上访”的,但他不是直接从老家河南周口,而是从烟台他大女儿家来青岛的。既然“上访”,对象当然也是姜树茂。而且他不像我空着手到机关去见,而是带着烟台的特产苹果到姜公馆去觐见。想当初是姜树茂为了稿子到《青岛文艺》给他送,现在却成了他到姜公馆给姜送,苹果还是苹果,所引起的就是时移世易,而不只是今昔之感了。姜树茂对老陈比对我好一些,说如果他当时不受“冲击”,也许老陈就不

至于遣返了，但现在他也没有办法，只能让老陈回家等着，只要中央有了文件，一定先给老陈摘帽。但这样一钱不值的空头支票，精明如老陈者还不是当成耳旁风吗？

我和老陈在武作育大哥家住了一个星期。我在参与接管山东大学时，他俩还是文学院的学生，年龄都比我大，作育是同班的老大哥。我主编校刊《山大生活》，编辑全是各院系的写作能手，他们就是其中的两位。后来陈硕上了文联筹委会，作育当了中学语文教师和教研组长。在这一星期里，我和陈硕除到市政府外面探听消息，还到青岛山上看了看“上访户”搭的窝棚，那是比贫民窟还贫民窟的贫民窟，简直像一座座高高低低的荒坟，令人惨不忍睹。这些无家可归的各类“分子”，靠行乞、“拉沿”（用一根带有挂钩的绳给爬坡的人力货车助力）、拣破烂过活，原来都是干部、教师和工厂、医院、商店的管理人员啊，现在却成了寄生虫式的无业游民，赶走了再来，好在青岛的山头有的是。难道这也是我今后的归宿吗？此外，我还到《青岛日报》原记者杨阳家里住了一夜。他也是我的好友，因为较早摘了右派帽子，没有被遣返，却降职降薪，当了校对，还离了婚，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单元里，和我一直在通信。我的家庭变故就是他通知的。赵大哥、武大哥、杨大哥的隆情厚谊和姜树茂的冷血，——不，应当说狼血，因为他是喝狼奶长大的——，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对比，爱和恨在心中如此激烈地冲撞，使我下定决心活下去，不能让亲者痛仇者快，不能，绝对不能！

## 六

我回了刘堂。连孩子都没有见到，我不甘心。我连死也觉得无所谓了，还怕

什么？遣返六年了，我一直老实“改造”，严格要求自己。现在，我不再相信什么“改造”的谎言。姜树茂分明连我“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路也给截断，只希望我一死了之他才称心如意。他越这样，我越要活，而且活得像个人，不再是贱民。为此，我对村支书刘同山的威胁作了绝地反击，挫败了他的嚣张的气焰。对此，我已在《遣返·乡情·威胁·反击》一文中作了叙述，这里不再重复。

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广播喇叭里整天播放“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刘少奇一类骗子”，乡亲们不懂，我就告诉他们是谁，并且说都死了。接着是周恩来、朱德，而最震撼人心的还是毛主席。“呸，他咋也会死？”“不是说能活到一百五十岁吗？”“‘万岁万万岁’还不是咒他！”——这就是乡亲们的反应。“人亡政息”则几乎是我的直感，紧接着的四人帮“一举粉碎”更增强了这种信念，因而1977年我照例用毛主席诗词为乡亲们写的春联就有了新的、现实的意义：“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可不是吗？“毛泽东时代”就要一去不复返了。

## 七

1977年4月10日，粉碎四人帮已经半年多了，政治空气趋向轻松，华主席的讲话里在“地富反坏”下面竟然没有了“右”字，应当不是无意中漏掉。我决定再到青岛探探风声，就先到杨阳那里住下，然后去文联见姜树茂。他问我又来干什么，我说落实政策。他还和上次一样，好像我没有资格直接找他，叫我到文化局去见宋毓英科长，因为她管人事，现在是文联和文化局“合署办公”。我遵命到文化局，已经有一个女人堵在门口。显然是姜树茂给她打了电话。“你就是刘禹轩吗？”她明知故问。“是的，”我如实回答。“姜主席说了，叫我告诉你，

对你没有什么政策可以落实……”“可是，”我打断他的话说，“华主席已经不说五类分子……”“我们山东还是五类，”这次是她打断了我：“……还是‘地富反坏右’！”她恶狠狠地说，紧跟着恶狠狠地“砰”一声关上了大门。

我楞在那里，似乎失去了知觉，好久才恢复了理性。好你个姜树茂，上一次假手公安局，这一次推给了一个女人！你们以为我会气死在你们面前吗？听说你们给江青写过效忠信，现在她完蛋了，你们还能威风到几时？我怀着比上次更大的悲愤回到杨阳那里，好在这一次姜树茂没有问我住在哪里，我也不会告诉他，而且杨阳虽然是个“摘帽右派”，但作为一个资深的记者，人缘好，朋友多，消息灵通，要我多住几天，会会朋友，而且带着我去见了两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我们当然都哭了。妈妈牺牲后他们就成了童工，两个人住在最多十个平方的房间里，弟弟靠窗，姐姐靠门，中间挂着一块布幔，外面既是姐姐的卧铺，也是姐弟的厨房。厕所是一层楼公用的，而且男女不分。我只觉得伤心惨目，是自己毁灭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现在，我又不能向他们倾诉我这些年受到的困顿和羞辱，只有让他们听听杨伯伯给他们的安慰和鼓励，让他们坚强地、好好地生活，今后的日子会有好转。

这一次我在青岛住了十天，除杨阳、石可和武作育三兄外，还受到了十几位旧友新知的盛情款待。我带着多年来不曾感受到的友谊，于4月20日乘“长绣轮”到上海，转搭江船到九江看望阔别了二十九年的三哥和他的“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的大家庭。他陪我游览了庐山和九江市内和附近的名胜，其间我还特别到南昌看望了曹述之兄，他也是四人帮粉碎之后才来探视女儿和女婿，此前深怕自己的右派身份会带来麻烦给他们。5月23日，述之来九江，在三哥处待了一天一夜，我们三个相谈甚欢，次日我和三哥送他上船回山东老家牟平曹家

庄。他说姜树茂是个不见棺材不流泪的人，在政策没有确定之前再也不要找他。这样我也就在6月4日离开九江、经武汉到开封回刘堂，在三哥那里住了三月之久。

## 八

我决心不再和姜树茂打交道，照述之说的耐心等下去，万万没有想到竟等来了鬼。这是个人，大号林河水，外号林小鬼，足可想见其为人。他原是《青岛日报》的美术组长，实则对美术一窍不通，调到文联当秘书长，最善于审时度势，屈伸自如，因而一直左右逢源，斗人（如反右）时大打出手，挨斗（如被当成走资派）时跪求饶命。按资历和级别他原来远高于姜树茂，后来眼见姜平步青云，就卖身投靠，成了他的走卒和帮凶。这次他奉命来到刘堂，是为了让大队为我“安排工作”，说青岛是个海防城市，右派分子即便摘了帽子也不准回去云云。我请他出示文件，他说文件“保密”，并且蛮横地说他还要到陈硕和曹述之那里去，不要耽误他的公事。果然，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他们两个的来信。陈硕说，海防城市多得很，大连、天津、烟台、宁波都是，难道那里没有右派？都不能回城？我给杨阳去信，请他打听一下，他说都没有听到有这样的文件。就在这时，即1977年10月，我的孩子来信要我到青岛去和他们一起生活，说有没有户口也不要紧，现在不会有人告密了。于是我就到姐姐那里，从开封坐火车到了青岛。

我终于和孩子在一起了。他们是两个二级工，我又连生活费也没有了，好在有兄弟姊妹支援，还算得上是城市贫民。鉴于上两次的教训，我对文联“保密”，免得再受姜树茂的迫害。又过了半年，即1978年4月17日，听说11号文件下

达，活着的右派一律摘帽和“回收”，我才写信给文联，说我已在青岛。四个月之后，即同年9月13日，当年“押送”我回原籍的刘某找到我，说先就近到牟平把曹述之办回来，次日陪我回刘堂办理迁回户口和粮食关系等手续，然后去周口给陈硕办。这样，我就和他同去陆圈公社，很快办完，我到刘堂把床、被褥、桌凳、隔扇（屏风）、剩下的粮油以及做饭用的煤油炉子全都给了乡亲，第二天就去开封姐姐家过了中秋，然后乘火车到青岛，不仅又成了“人民”和“市民”，而且又成了干部，并且又和姜树茂搞在一起了。

## 九

“文化大革命”被党定性为“十年浩劫”，并由此而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对于姜树茂意味着什么呢？我和他只有过对话，没有过谈心，因而无从知道他的想法，但从他的表情和表现看，一定谈不到欢欣鼓舞，像广大的人民群众那样。一个“文革”时期“窜红”的贵人，一个通电效忠于“文艺旗手江青同志”的“作家”，特别是惨淡经营了几年的长篇巨著《渔港之春》刚出笼就被封杀，他会和我们这些被他“封杀”二十几年的“改正右派”一样心情吗？许多复出的右派作家的作品真像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使得他的《渔岛怒潮》不是相形见绌，而是无地自容。他的失落感和危机感是掩饰不住的，这从他的阴沉的脸色得到了反映。从1978到1983的五年间，读者没见他发表过哪怕一个短篇，他的大作不但令人不忍卒读，而且感到恶心了。而就在1983年，又一个回合在我和他之间发生了。



在这时的文联，“林小鬼”已经调到群众艺术馆去当副头，孟力也去了水清沟工人文化宫。孟力之去凸显了姜树茂的绝情弃义。原来孟力在文革期间也以“疏散”的名义被全家下放到潍坊乡下当了几年农民。他较早回到文联，却已无房可住，而文联的三层楼上除住着胡子红卫兵张健一家外还另有空闲的房间。但是姜树茂硬是不让孟力入住，借口是档案室，要保密。孟力一家只好在底层中间几平方凹入的厦子存身，姜树茂竟然也不允许，叫孟力到山上去找废弃的防空洞。来了倾盆大雨，孟力不得不从楼门进入楼内，敲开六平方的传达室，姜树茂竟然以永远不给解决住房问题相威胁，孟力不得不离开服务大半辈子的文联另谋他就。还有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的仇非，也随着改革开放，先被开释回了邹平老家，后来又得到改正，到文联来要求复职，姜树茂知道他早已被妻子离婚，无家可归，就“劝”他回去另立新家，以给他长一级工资为诱饵，仇非就中了圈套，不久就死在邹平。至于我和陈硕、曹述之终得回来，也完全违背了他的本意。而我和他的这一次冲突，起因也正是住房问题。

原来，我们三个“回收”的“改正右派”，原有的住房早已另有新主。除了我和两个孩子住在十平方的单间之外，陈硕的又一个女儿嫁在周口，现在是老两口和两个女儿被安排在机关的一个房间里，述之一个人就以资料室为家，晚上把两条长凳并在一起就是卧床。文联以我们三人的名义，报请市委批准，从在建的一座六层楼里挖了三套小的单元。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五年，我的一对儿女已经三十、二十九岁不得结婚，大楼好不容易落成了，却没有我们的份，难道就这么听任姜树茂永远欺负下去吗？他说了，新房给远些的老同志，让他们往里靠一靠，腾出来的旧房给我们。我听到这一决定，当即找到姜树茂，说我要到北京告状，想不到在他眼里，我们这些“改正右派”还是低人一等。要说“老同志”，

还有比我们三个更“老”的吗？真是欺人太甚！不等他解释，我立即到火车站买票回家。晚上，新来不久的编辑徐培范奉命到我家，说姜主席叫我别去北京，房子问题明天再商量。我说票已经买了，我还有别的问题要反映。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北京。在这里，我不能不说一下我见了谁，他们怎样帮助我，以表示我终生的感激。我先找到了四机部的办公厅主任晁敏。他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他带我去见另一位同班女同学，首都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苏克尘和她的丈夫马仲扬同志，《红旗》杂志的常务副主编，部级高干，也是抗战时期流亡中学的同学。仲扬说我来得正好，在耀邦同志的主持下，现在正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高潮。问我要不要写一份材料让他转给耀邦？我一听，脑袋都大了，忙说不敢，他日理万机，我这样一个小干部的小事儿，怎么好塞到他那里去？仲扬说：“那我就写封信介绍你去见姚锡华，《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个报是专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我立即照办，受到了姚总的亲切接待，并提出了三条意见让我选择：一，把我写的材料转给青岛市委。这一条我不同意，我认为市委一定会转到姜树茂的手里。二，发“内参”，即编发我的材料供有关部门参考。这一条我觉得离落实很远，很可能旷日持久。三，派记者前往调查，写出报告。我当即表示同意。姚总就写了几句话让我带着去见群工部的王晨同志。王部长让我回家等着，说一定派记者到青岛去。我回到晁敏那里，孩子刚来了信，说文联已经让徐培范把新房的钥匙送到了家。于是我又在敏兄那里住了两天就赶回青岛，并且知道陈硕和述之也有了房子，陈硕的是“套二”，我的是“套三”，都很小，但总算有了存身之地。述之给了个火车站附近的“套二”，却得爬八层的楼梯，这不是故意让一个老人为难吗？后来他换了个底层的“套一”，才算也有了自己的家。

我总不能不向姜树茂报到。他正在和两位“领导”谈话，搭讪着问我在北京

都见了谁，我本来想说：“谁都比你的官大，谁都比你的架子小！”但是忍住了，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和他计较，就说见了几个同学。奇怪的是，此后再见了，他脸上居然绽开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没过几天，《光明日报》的记者范有德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他根据我写的材料，奉派来青岛作了几天调查，现在要回北京了，想和我见面说一下，我当然即刻赶往他所在的宾馆。这是一位很英俊的青年。他说，按照规定，他先向市委宣传部请派一位联络员，是叫刘萍的女同志，由她通知有关同志到宾馆里会见，包括现市委宣传部部长董海山，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现市政协副主席陈波萍，原市文联常务副主席、现市社科联副主席林明，现文联主席姜树茂等同志，证明我所反映的情况全都属实，例如宣传部董部长就说，他不知道右派改正后不准回青岛的文件；政协陈副主席说，当年他主持市委宣传部和市中苏友协的肃反运动，在得出我的历史问题早已交代清楚，决定恢复我作为预备党员在友协被取消的党籍，并已书面通知了文联，当时的支书林明也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只是不久我和林明都遭到“错划”，林明也被开除，我当然更谈不到恢复了。至于房子问题，文联姜主席说已经解决。所以，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当晚就要回去复命了。

## 十

北京告状之后，我和姜树茂相安无事已达十年之久。他在这十年里颇显消沉，不见有什么作品发表，架子也小多了，只是89年“六四”风波时忙活了一阵子，因为当时上街的不少，他主持开了几天会，要大家“讲清楚”。期间我到兰州弟弟那里住了将近一月，回来高潮已过。否则会不会牵涉进去就难说了。但是，树

欲静而风不止，冲突又发生了，还是因为房子问题。

老一代的干部都知道，房子是按级别配给的。我在划右之前和妻子在李村农科所和文联各有一套住房，总面积在一百平方左右。我划右后住房被没收，她殉职后两个孩子成为童工，被安排在一间十平方的小间里，我和他们住了五年，上面已经说过。1983年上访得来的一个小单元虽然名为“套三”，总面积连三十平方都不到，三十多岁的儿女相继结婚后，三家五口挤在一起，困难可想而知。当然，子女的住房我没有理由向文联的姜树茂要，但是要他补足我按级别应得的一份，或至少把劳教之前的那一份还我，总是应该的吧？事实上，改革开放十年以来，除了三个“改正右派”，文联哪一个领导层同志的居住条件没有改善？众所周知，当时许多单位年年都盖房子，旧房的户主即便死了，也不能把老伴和子女撵出去，新添的职工就拨给落成的新房。文联人数不多，无力单独盖楼，但和别的单位联建的专款还是有的。就说他姜公馆吧，一家四口住着一层楼，整个楼梯也姓姜，进了楼门还得打开一扇旁门才能踏上第一个台阶。我虽然级别比他高，但作为一个“群众”，从来就不曾和他姜大官人攀比。我们几个“回收”和稍后调来且已离退休的“老同志”，多次向他提出，他也答应给解决，但是一拖就是一年，因为总是到春节前开会时才有机会见到他，听他作年度总结，特别是住房问题有何进展。

开会了，新老干部济济一堂，先请姜主席讲话。他向大家祝贺春节，却闭口不谈住房问题，只是新来的张秘书长说，今年又没有房子，各位还是得耐心等待。我一听就火了，打断他的话说：“姜主席为什么住一层楼？楼上一间原来还有一家住户，他以文联的名义弄了个‘套二’请人家搬走，全楼上就成了他的一统天下。——请老姜你说说是不是这样？”他一时竟说不出一句话来。“所以，”我接着说，

“姜主席有的是办法，但是只用来以权谋私，一到为了别人，特别是我这样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他的人，就把责任推给别人。那一次你要把我轰出青岛，就推给泰安路派出所；四人帮都粉碎半年多了，你还要赶我，又推给宋毓英；这次你又推给新来的张秘书长。你一贯摆‘一把手’的官架子，把办理实际事务的工作人员当衙役使唤，我不能不告诉张秘书长，千万别再上你的当！”

我越说越气，真所谓新仇旧恨齐上心头，又看到全体人员都在倾听，就像泄洪一样一发而不可收：

“你可能已经忘记，当年为了给你抄《渔岛怒潮》，你竟然不准我请假到九江三哥那里和病危的母亲见最后的一面，以致抱恨终天……”

我说到这里不由得哽咽起来，大家也互相张望，显然想不到竟会有这样的事。既然说到这里，我就索性说起了《渔岛怒潮》：

“你凭着《渔岛怒潮》成了大作家，你知道真正的作家是怎样评价的吗？我是菏泽地区的人，1983年菏泽市邀请我去参加‘牡丹笔会’，可能你还记得。我回来没好意思对你说会议的经过。到会的还有北京的汪曾祺、从维熙、林斤澜、陈建功。他们听说我从青岛来，就问我认不认识姜树茂，我说那是我们青岛文联的主席呀，你们怎么认识他的？汪曾祺说他不认识，但是久仰大名，因为除了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当时能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是你的《渔岛怒潮》了，找来翻了翻，实在‘不忍卒读’。从维熙说他认识，因为当时他在西安劳改，你在西安制片厂改编电影，就调他去给你帮忙，是不是这样？”——姜树茂仍然憋气不吭，我只好继续说下去：“从维熙说，那一段日子真是‘不堪回首’。另外，你在《电影艺术》上不会没有看到过，影视界的领导和权威袁文殊曾经说过，你把几个孩子写得神乎其神，用弹弓打掉国民党军队的步枪，不是艺术而是‘儿戏’。

据我看，《渔岛怒潮》就是这么一本给孩子看的大人书，给大人看的小人书。现在谁还看你这些东西！想当年你弄这本书，我们四个右派为你累死累活，我给你抄了至少二百万字。我们打扫卫生，冲刷厕所，挖防空洞都心甘情愿，因为我们是右派。可是你凭什么役使我们给你干活，还得受你的超阶级的剥削？我今天就告诉你，我保留向你索赔的权利！”

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显然还期待着我。于是我说到他不久前刚出版就被封杀的《渔港之春》。原来这部小说是“揭露”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大批刘邓所鼓吹的“三自一包”的。我现在的老伴就是新华书店的职工，亲眼看到了禁止发行的文件，姜树茂偏说是“脱销”了，不是在自欺欺人吗？至于最近出的《长乐岛》，更是一钱不值，因为打三折都没人买，只好拉到造纸厂还原成纸浆了。我又说到我的党籍问题，陈波萍、林明都在，为什么他不找来当面说个明白？还不是故意把我关在门外？好在我现在的“觉悟”也提高了，“入党做官”吗？我不是那块料。好党员我不比不上，他这样的我还羞与为伍呢！一个人总应该与人为善，所谓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他总是反其道而行之。如果可能，他不但不愿意恢复我的党籍，也不愿意恢复我的“人民籍”、“干部籍”，因为他正是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的“典范”。我终于能够恢复人民和干部的身份并回到文联，是党违背了他的意愿促成的。依着他，我还会有今天吗？我常想，一个作家总得有点人味，就是人性，也就是起码的人道主义，我请大家评判一下，姜树茂对待我的一系列行为还有没有“人味”？当然，他可以说我说的全是不实之辞，是污蔑，那好吧，他可以到法院告我个诽谤罪，我等着，请他拿证据出来。而我有的是证据。例如，宋毓英同志还在，她当年把我拒之门外说奉你姜主席之命，我相信今天她不会自己包揽下来。又如宣传部董部长就没

听到过有摘帽右派也不准回青岛之说。他病故了，但是林河水还在，我见过他，问他当年是谁要他对我和陈硕、曹述之说青岛是海防城市，不准我们回来的？他用他的胶东“儿化腔”回答说：“还不是\*养的个姜树茂儿！”——说到这里，我问姜：“是不是把林河水找来对质一下？”

我见他好像失语似的毫无反应，只好结束自己的发言说：“很对不起，耽误了大家的时间。我这个人涵养不够，容易冲动。但我实在觉得姜主席太过份了。就是对右派要站稳立场，也不该不讲政策，自己加油添醋，甚至捏造党的政策。现在已经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也没有四类五类分子了，人道主义也不再是坏字眼了，我希望老姜也能提高一下自己的觉悟，对我们不再歧视，摆架子，穿小鞋。——我的话完了。”这一来，主持会议的辛显令副主席（电影剧本《喜盈门》的作者）也松了一口气，显然觉得会议再开下去不会有什么好，就站起来高兴地说：“那我们就算闭会而不是散会，大家到饭店去会餐！”于是全体起立，各自方便，曾被姜像训顽童一样训斥过的高老，趋前和我紧紧地握手，有人还为我从身后披上大衣。驱车到饭店后，我和姜树茂相邻落坐，他竟出乎我意外地拆开桌上的烟盒，掏出打火机为我点烟，然后又向我敬酒。

## 十一

春节期间，来给我拜年的同志特别多，都说过去也听说过并且感觉到姜树茂对我很粗暴，却想不到这么“绝”。就连辛显令同志也这样说，还说他调来这些日子，只见过老姜“哈唬”别人，没见过我这样指摘老姜的，当时也想打断我的话，劝我另找个机会单独沟通一下，又觉得连他都不吭声，我凭什么不让你发言？

我说，过去的事情我早就不愿意再提了，可是老姜也实在欺人太甚。同志们大多知道我的遭遇，特别是我的家庭的变故，我回来后，都在私下里对我表示过同情，使我感到温暖，这个春节就是一个温暖的春节。你辛副主席，还有尤凤伟副主席，年年春节都来拜年，各个单位的领导，哪有到春节不看望离休老同志的？可是，我回来十三年了，离休也三年了，他老姜来过我这里一次吗？我住在哪里恐怕他还不知道呢！有几位同志还说，我在会议上说那些话正是时候，因为姜树茂已经到了年龄，不久就要退休，忙着找另外的官位去坐了。那些话再不说，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果然，消息陆续传来，说他已经内定去当市人大文教委员会主任，说新官上任前照例要体检，说他查出了癌症等等。这最后一条起初都不大相信，因为他一直很健康，没听说有什么病。但是不久竟得到了证实，说他在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青医附院）动了手术，是专门从上海请了两位专家坐飞机来的，并且说手术很成功。我已经离休在家，消息都是在职的同志告诉我的。我想，既然手术很成功，我一定到医院去看望他。那天开会，我冲动得厉害，言辞确实有刻薄之处，而他却表现得足够宽宏大量，聚餐时还那样彬彬有礼。我痛恨幸灾乐祸的小人，认为他如果能对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对他为什么就不能不念旧恶，“咸与维新”呢？

但是，事情是不以人的愿望为转移的。他的病情竟如此急转直下，以至于不能不把他送往北京去就医。大概有一个来月吧，文联接到通知，说病情恶化，回天乏术，只好派四位同志到北京去接他回来。1993年6月9日上午9时许回到青医附院，当晚21时30分永远闭上了眼睛。这是参与接送的培范事后亲来告诉了我的。



## 十二

现在，姜树茂去世已经9年又三个多月了，上面说到的母振元、仇非、曹述之、陈硕、石可等五个右派都已先后作古，林河水和吕斌这两位男女“左派”加上三个胡子红卫兵中的张某也都已化为灰烬，1993年主持春节会议的辛显令同志也不幸病逝，文联的八个右派只剩下林明、孟力和我三个，加起来是262岁，怎么说也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语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不敢这样自许，却实在愿意说点真心话，也就是撇开个人恩怨的感情色彩，尽量服从理性的召唤，谈谈我自己的感想。

首先，我认为，不论右派还是左派，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活得很不幸，很不正常。右派不必说了，就说姜树茂、吕斌、林河水这三位文联的领导，或曰当权派，能算生活得很健康很幸福吗？甚至于可以说很清白吗？那三位遣返、押送我和曹述之、陈硕的刘某、倪某、张某，到晚年一点也不觉得有愧于心吗？我们真的一点也没有惹过、得罪过他们。当然，地富反坏右都曾长期被认为坏人，可他们三位不是小孩子，不是精神病人，没有犯罪的“豁免权”，即便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和判断，也不应该像姜树茂那样，凭自己的好恶，生杀予夺，变本加厉，越出甚至捏造政策去增大迫害的“力度”，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不仅是一个“立场”问题，而是道德的问题了。

其次，我认为我国的文艺政策是苏联的复印件。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也叫“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既革了现实主义的命，也革了浪漫主义的命，就像“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大革了文化的命。《金光大道》、《艳阳天》和《渔岛怒潮》就是这种所谓“二革”的“样板”，《渔岛怒

潮》只不过更加拙劣而已。我做过多年友协工作，读过不少苏联小说，改革开放以来，从朋友、苏联文学专家蓝英年的有关著作中，得知许多斯大林文学奖金得奖者的命运，几乎和姜树茂如出一辙。例如巴巴耶夫斯基，原本是一个农村的穷庄员，半文盲，老婆孩子吃不上饭，他决定把自己吹捧农业集体化的小说手稿《金星英雄》送到《十月》杂志碰碰运气，然后回家，因为在莫斯科他等不起。小说发表了，一封电报把他召到莫斯科，高级轿车接到党中央，等着他的是日丹诺夫。

“1948年《金星英雄》获斯大林文学一等奖，巴巴耶夫斯基得到一枚金星勋章，自己也成了金星英雄。1950年、1953年又两次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一时成了苏联最走红的作家。”（见蓝英年《寻墓者说·“金星英雄”话今昔》，下同）他成了最高苏维埃代表，还访问过中国。“但在作家当中他从未有过威信，连提携他的潘菲洛夫也看不起他。斯大林死后他是最先被人忘记的作家。六十年代则被当成粉饰现实的作家代表屡遭嘲讽，七十年代后已无人提起他。”1995年他曾有一篇《答记者问》，谈到苏联政权的垮台，他说：“我对自己说也有我一份责任。我写的书只一味歌颂，没能批评某些不良现象。我敢这么说是因为我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反正活不了几天了。我本不是作家，是他们把我制造成作家的。……我可怜拉斯普京，他还年轻，可不等他死就被人活活忘掉，就像人们早已把我忘掉一样。”——我们看，巴巴耶夫斯基之所以短命，是因为他这位作家是被别人“制造”出来的。其实，哪一个“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家不是如法炮制出来的呢？巴巴耶夫斯基只是在苏联消亡之后才说他只歌颂没批评也有一份责任，如果不是这样，他不但不敢，恐怕也不肯这样说。一味拍马吹牛涂脂抹粉的作家必然短命，难道不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事实吗？

上面说到巴巴耶夫斯基在作家中从未有过威信，“连提携他的潘菲洛夫也看

不起他”，是因为潘菲洛夫是权威文学杂志《十月》的主编，也是因写了吹捧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磨刀石农庄》而在文学界成了一霸的。他对《十月》实行家长式的统治，编辑们管他叫“费佳大叔”。是他发表了《金星英雄》，使巴巴耶夫斯基跃上龙门，却认为写得远逊于自己的《农庄》。姜树茂是青岛《海鸥》文学月刊的主编，作风和“费佳大叔”颇有相似之处。改革开放以来，谁在《海鸥》上看到过有些棱角的作品？老实说，如果他能采纳我们几个编辑的意见，“伤痕文学”就会首先出现在青岛的《海鸥》了。当然，政治把关是他的责任，宁紧勿松（或曰宁左勿右）只会得到赞许而不会受到批评，因而我对他的谨慎能够理解，但说他“为繁荣发展我市文艺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等等，就未免把鲜花插在牛粪上了。还有，“作风正派，光明磊落，为人正直，团结同志，勤奋好学，任劳任怨”，把他几乎说成“完人”，更是言过其实。我们几个集中在资料室的右派都知道，他很少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需要引经据典时总要叫我们给他找。他作为一个作家，应当在语言文字上多下功夫，他从五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到九十年代成为“著名作家”，就是从文盲起步，四十年也该过了语文关了。可是他写了一辈子“渔岛”“渔港”，始终没有掌握“鱼”和“渔”的用法。例如，“打鱼”还是“打渔”？“鱼民”还是“渔民”？“鱼夫”还是“渔夫”？“渔业”还是“渔业”？“鱼船”还是“渔船”？每到这种场合，他就不耻下问，不找别的同志，单找我们几个“下人”。这常常使我想到外国和中国的工农兵作家的不同。莎士比亚生在农村，只上过小学，狄更斯从六岁就跟父亲蹲债务监狱，和高尔基、杰克·伦敦都没有上过学；就连中国的沈从文也是当兵出身，为什么他们都能自学成才，成了大作家，而新中国的所谓工农兵作家，如崔八娃、胡万春以及后来还保送上了大学的高玉宝，都成不了气候？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客观条件有

了变化，有的是主观努力不够，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被“制造”成了半成品或废品的。因此，随着改革开放和教育的普及，作家就是作家，再没有必要专门培养（制造）工农兵作家了。

### 十三

上面就是我所亲历的姜树茂现象。什么是“现象”？《辞源》的“本体和现象”条目据康德说：“本体指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现象是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形成经验材料，再加上人的感性和知性的先天形式而产生的，是人们认识的对象。”又在“本质和现象”条目中说：“现象是本质在外部的表现，一般是人的感官所能直接感觉到的。……假象也是事物本质的一种表现，但它是事物本质的一种歪曲的、颠倒的表现。”姜树茂作为“自在之物”即我还不知道他的存在时，他对我来说是不可知的，也就不可能是我认识的对象。但见了他并和他相处之后，他就作用于我的感官，形成经验材料，再加上我的感性和知性的先天形式，他就成了我认识的对象，一如我成了他认识的对象。这种“互认”就形成了我俩的敌对关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也就是“他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关系，也就是他和他治下的几个右派的关系。这种关系使我们形成了一种共识：他本质上是不学无术和嫉贤妒能的，但又急想成为作家，就尽量以谦恭或高压的姿态加以利用，功成名就之后，认为不需或不便再加利用，又怕被利用者会揭他的老底时，他就恨不得和他利用过的知情者永不再见，就像江青对待她当年的上海旧人那样，只是他没有她那样的权势，不能大开杀戒而已。想想吧，他对几个帮助、提携过他成为“作家”的右派，包括他给摘了帽子的孟力，如何忘恩负义，

心狠手辣，一个个流放出去不准回来，甚至捏造政策，称得起犯了“假传圣旨”的罪，如果他成了政法委书记，还有我们特别是我的活命吗？他和江青一样，“自在”时是一个样，“作用于人的感官”则因人因时因事而大异其趣：不是金玉，就是败絮：在“金玉其外”荣光遍体时是假象掩盖了本质，在“败絮其中”暴露无遗时是本质撕破了假象。这种现象大量甚至普遍地成为假象，将包括国家和社会在内的事物的本体和本质都歪曲和颠倒了的时候，也就是快要改朝换代的时候，苏联解体前层出不穷的大清洗现象、斯大林（从“父亲”到杀人狂）现象、赫鲁晓夫（上台到下台）现象、戈尔巴乔夫现象、巴巴耶夫斯基现象、“费佳大叔”现象、法捷耶夫（自杀）现象、索尔仁尼琴（被开除作协和驱逐出境）现象等等，不都是现成和现实的例证吗？

本体也好，本质也好，和现象并不是同一的。但到了总是两相背离，即现象多半都是假象的程度，就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了。实际上，在一个正常和平常的社会里，既没有多少假象，也就不会有太多的“现象”。而在我们这里，上而至于刘少奇现象，林彪现象，下而至于杨佳现象，邓玉娇现象；有了姜树茂现象，也就有了刘禹轩现象，孟力现象；有了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现象，也就有了十五万多大小不等的右派分子的现象；冤假错案之多，访民之多，在在都是滋生“现象”的土壤。过去我们这一代人都会被灌输一种至高无上的信念：“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在谁都以之为忌讳。不错，我们在经济上已经抛弃了前苏联的做法，但是政治上呢？是不是到了应当认真考虑的时候了？再不要相信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的斗争哲学，再不要制造姜树茂那样的“著名作家”、“人大代表”、“领导干部”以及他和我们几个右派分子那样的对立，再不要制造老老少少的红卫兵，再不要形成前苏联产生过的那么多“现象”。我所亲历的“姜树茂

现象”和我和他的斗争，这些年不断地引起我的反思。我俩一直别扭到他死前不久，他最后的表现使我一直念念不忘。他为我点烟，向我敬酒，是不是有所愧悔？是不是“悔其少作”？是不是觉得不是我而是他自己应该被允许“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我真的觉得，希望，并且相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都能够成为“新人”，成为朋友，从而化干戈为玉帛，都能生活在在一个真正和谐、安定、环境和心灵都免于污染的世界。遗憾的是不久他就“走”了，我只能祝愿他已经安息在一个没有对立，没有迫害，没有忌恨，没有“现象”的世界里，而我也将得到同样的安息！

2012年8月23日

作者简介：刘禹轩，1928年出生，山东省东明县人。194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同年参加工作。曾供职于山东省教育厅、山东大学、青岛市中苏友协、青岛市文学期刊等单位，1990年离休。历任有关刊物编辑、主编、编审等职务，并在离休后作为“编外教授”在大学外文系讲授英美文学、莎士比亚选读、翻译、美学等课程，期间担任青岛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兼会刊主编。